

## 精品意识·团队精神·严谨学风

宗 福 邦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2)

近30年来,作为一个专职科研人员,我一直从事集体性的重大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1975年至1987年任《汉语大字典》编委兼武大编写组组长,1986年至2003年主编《故训汇纂》,目前主持《中华大典·音韵分典》和《古音汇纂》的编纂工作。无论是已出版的《汉语大字典》与《故训汇纂》,还是正在编纂中的《古音汇纂》和《音韵分典》都属于国家或教育部的重点研究项目,都是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性的工程,凝聚着参编者们的集体智慧,反映了一种团结奉献的精神,体现出一种朴实无华的严谨的学风。下面,主要围绕《故训汇纂》编纂实践谈点个人的体会。

第一,精品意识。一个研究所要站在本学科的前沿,才有自己的学术地位,而高水平的、厚重的科研成果,正是一个研究机构学术地位的标志。武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之初,在制定科研规划、确定研究项目时,我们确立了这么一个原则:在学科前沿寻找一个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切入点与突破口,力争出精品。《故训汇纂》是教育部“七五”及“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篇幅宏大、内容浩瀚、周期长、高难度、高风险的项目作为突破口,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从学术渊源来说,武大中文系历来被学界视为章(太炎)、黄(侃)学派的一方重镇。著名学者刘博平、黄焯、程千帆、周大璞、李格非长期执教武大,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英才。中文系素有从事传统语言典籍整理研究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优势。《故训汇纂》的编纂蓝图正是在黄侃关于校补《经籍纂诂》的学术思想启迪下逐步形成的。选择《故训汇纂》有利于发扬自己学术传统的优势。其次,当时成立不久的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其主体是《汉语大字典》武大编写组的业务骨干,这是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不仅与章黄学派有学术渊源,而且经历了《汉语大字典》编纂实践的洗礼。他们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志趣相投,配合默契,这正是需要协同攻关的重大科研课题所首选的研究队伍。换句话说,承编《故训汇纂》,正有利于发挥我们研究队伍之所长。经历了18年艰辛,2003年7月《故训汇纂》终于出版了。《故训汇纂》是一部以全面、系统地辑录先秦至晚清古籍中的字义训释资料为目的的大型语文工具书。与清代训诂学巨著《经籍纂诂》相比,就资料辑录范围而言,《故训汇纂》涵盖了自先秦至晚清二千多年训诂史的全部成果,这是仅以收录汉唐旧注为目的的《经籍纂诂》所不能比拟的;就内容而言,《故训汇纂》篇幅约为《经籍纂诂》的4倍,内容更为丰富全面。可以说,此书的价值已远远超越了《经籍纂诂》。《故训汇纂》出版后,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把它与《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并列,称它们为汉语辞书的5部代表作。应该说,《故训汇纂》的编纂实践,证明了我们当初的抉择是正确的,我们的目的已经实现。

第二,团队精神。对于《故训汇纂》编纂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们虽说也有思想准备,但编纂周期竟长达18年,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为了编纂此书,在资料搜集阶段,项目组全体成员花了5年多的时间,用手工方法,辑录了近70万张资料卡片。在编写阶段,这近70万张卡片,经过爬梳、筛选、分析、排比,纂成初稿,然后经过反复修改,终审定稿为1300多万字的宏篇巨著,这期间又经历了整整12年。一个学者如果能有五六十年学术生涯的话,18年就是他1/3的学术生命。如果说,一个学者以18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撰写一部著作就已确属难得的话,那么,10多个学者为了同一个目标在一起默默耕耘了18年,不是更为难能可贵吗?在这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时代,人们崇尚速度,事事讲求立竿见

影。高校的收入分配制度、职称晋升条例，从某种程度上同样在引导人们急功近利。而编纂《故训汇纂》却是一项长期坐冷板凳的工作，参与此项工作就意味着寂寞与清贫，意味着职称晋升比别人慢半拍，意味着将失去许多本应获得的东西。在浮躁学风、拜金浪潮面前，《故训汇纂》项目组的成员逆水行舟，执著追求，不改初衷，把为国家文化建设做点实事看得比职称金钱更重要，这就是《故训汇纂》历经18年风风雨雨而始终没有夭折的最重要的因素。这说明，《故训汇纂》项目组是一个有理想、有奉献精神、有凝聚力的科研集体，这个集体的核心是有凝聚力的核心。

第三，严谨学风。质量上严格要求是《故训汇纂》编纂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深知，此书成自众手，要达到高质量，确实是个难题。众所周知，在质量问题上，认真一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认真。但我们更明白：精品是打磨出来的，没有认真的态度，缺乏严谨的学风，再好的编纂蓝图都会在编写中走样，甚至会变成“豆腐渣工程”。因此，《故训汇纂》编写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对质量问题都有严格规定。比如说，该书规定所引资料必须采自原书，不准转引第二手资料。所以，当《故训汇纂》有80多种引用书与《经籍纂诂》相重时，我们没有图省事直接从《经籍纂诂》转引，而是自原书中重新辑录，并共获得20余万条资料。为此，项目组虽然付出了两年多的时间，但这样做不仅避免了因转引第二手资料所必然会出现的各种讹误，更重要的是还辑录到了一大批《经籍纂诂》漏收的宝贵资料。又如，1990年，当资料辑录工作告一段落，编写工作即将展开前夕，项目组全体研究人员不问老幼，不论职称，全都投入资料卡片的复核工作中，10多个人以近半年的时间，把近40万张用手抄笔录方式制作的选择式卡片，一一按顺序核对原书，共查出6000多条错误，从而为此书减少了几千条可能出现的错误。再如，2001年，当审稿工作结束时，项目组考虑到此书编、审工作历时八九年，体例上难免前后照应不一，决定将1000多万字的审读稿重新通读一遍。为此，定稿组4位成员用了两年多时间才算完成了这个任务。当然，通读后，字稿体例更显一致，也清除了不少错讹，使全书质量更上一层楼。

目前，古籍整理研究所承编的《音韵分典》、《古音汇纂》（《故训汇纂》的姐妹篇）正步入编纂高潮，回顾《故训汇纂》的历程，有助于我们开拓进取，登上新的学术台阶。

（作者系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吴友法）